

秦琰_著

元代也里可温作家
群体研究

馬 上 歌 桑 梓



元代
也里可温作家
群体研究

馬上歌桑梓

秦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上歌桑梓：元代也里可温作家群体研究 / 秦琰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ISBN 978 - 7 - 208 - 14604 - 4

I. ①马… II. ①秦…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元代 IV. ①I20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6409 号

责任编辑 屠毅力

装帧设计 陈 酌

马上歌桑梓：元代也里可温作家群体研究

秦 琰 著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2 插页 2 字数 256,000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4604 - 4/B · 1283

定价 68.00 元



中华民族的形成伴随着各个不同民族不断冲突和融合。

早在五千多年前，以黄帝、炎帝、蚩尤为代表的游牧部落与农耕部落之争，奠定了华夏民族的基础，开启了夏、商、周三代的文明。秦汉时期中原与匈奴抗争背景下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大汉王朝充满活力。五胡十六国与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导致唐宋成为世界文明的象征。元朝结束了辽、金、西夏、宋长期的分裂，最终出现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元帝国，产生出新的文明增长点，作用于明、清，影响到现代。可以说，没有南北东西众多民族的冲突和融合，就没有中华民族如此灿烂的文化。然而，长期以来，这些民族文明发展的节点，反而成为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其中，尤以文学的研究为甚。正如姚奠中先生所言：“在我国几千年的文学史研究上，有两个时期比较冷落：一个是北朝，一个是辽金元。北朝的北魏、北周、北齐，和南朝的宋、

齐、梁、陈时代相当。北朝共 195 年，南朝只 167 年。北朝占领着淮河以北以及漠北、东北的广大地区，时间又近 200 年之久，尽管中原文化随着晋室的南迁在南中国得到巨大发展，但北朝那样既久且大的政权，又占有中原地区，它的文化、文学，是绝对不容忽视的，而过去却被忽视了，至少是重视不够的。辽国立国和北宋相当，还早几十年；金代立国与南宋相当，元代则统一了全国。辽代领地虽也辽阔，但只占到中原边沿，在文化上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金代统治地区，略与北魏相当，前后达 120 年之久，其文化、文学直接承受唐、五代、北宋而有所发展。本应予以重视，而过去研究得却很不够；元代由于戏曲的全盛，研究的人较多，而传统文学的研究却只像蜻蜓点水。”先生进一步指出：“北朝、辽、金、元之所以不被重视，一个重要因素，可能由于它们皆系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之故。实际上这种偏见，应该予以彻底纠正。”（《元好问研究文集前言》，见《姚奠中诗文辑存》，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21 页）

至于如何来纠正，姚先生提出“大者远者先之”的原则。他认为：几千年来，华夏民族有一个优秀传统，那就是对民族文化的挚爱。孔子著《春秋》，强调“夷夏之防”，但“夷夏”并不以地区为界，而是以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区分。当时中国华戎杂处，孔子的“夷夏”原则是：凡接受华夏文化就把它和华夏同等看待；而放弃华夏文化的，则把它和戎狄等观。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历史家对境内各族所建立的政权，只要继续用华夏衣冠文物、典章制度来治理国家，使华夏文化得到继承，就都予以肯定。“二十四史”中，既有《魏书》《齐书》《周书》，又有《辽史》《金史》《元史》，都被称为“正史”，就是这个道理。本来北方各族与中原都有着血缘或隶属关系，某个民族建立政权之后，继承中

土的治国安民之术，便和汉族内部的改朝换代相同，民族矛盾也便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消失。因此，志士仁人的爱国主义，远超于爱某个王朝的范围，而是考虑如何能把我们民族文化继承并发展下去。（见《纪念元好问八百诞辰学术研讨会开幕辞》，《姚奠中诗文辑存》，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28 页）

姚先生的观念直到今天还是有着指导意义。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则，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为山西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制定了北朝、金元文学两个主要研究方向，后来扩张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下的文学与文化研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产生了一系列的成果。本书《元代也里可温作家群体研究》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种。

本书之特出在于：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民族而不是汉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其疆域之广大，民族之多元，使得元代文学具有与其他朝代不同的色彩。非汉族也即蒙古、色目作家，作为文学史中新的质素是其特点所在，理应首先给予关注。因此，本书选择元代也里可温这一作家群体为研究的对象，既是在前人已有的双语作家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探索和开拓，又能抓住元代宗教和文学的关系这一实质性的问题，对元代文学作深层次的解读。这样的成果自然值得肯定。用杨镰先生的话来讲：做这个课题本身就体现了重要的价值。

我们都知道：做元代蒙古、色目作家研究，面临着资料的零散和缺乏。搜求本来就很难，得到的资料又很难形成系统。也里可温作家群体更是如此。针对这个情况，本书作者以一网打尽的方式，细密工致地爬梳相关文献，精心找寻互相之间的联系，力图使重点人物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比如对康里部族及不忽木家族信仰的考证、汪古

部族信仰以及马氏家族华化原因的考索，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其方法和工作态度也是值得肯定的。

本书从元代也里可温作家群的角度再一次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先进性。作者以翔实的资料总结出元代也里可温人员身份认同的差异，导致对汉文化采取不同的接受策略。一般说来，方技人员重视自己的宗教身份，而文人则弱化了身份中的宗教内涵，更强调民族归属，对汉文化的认同主动而自觉。他们不仅仅是汉文化的学习者，更是保存和传承汉文化的中坚力量。“如赵世延、马祖常等人都是名重一时的儒臣，并且在元代诗文创作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由儒学思想之研习进入文学艺术之创作，由知识之积累，进入审美之感受，汉文化已然深入也里可温文人的血脉了。”这不正说明中华传统文化之先进与富有魅力吗？元代色目人华化之深一直为人们所关注。《至正直记》卷三记高昌偃哲笃世南家族子弟的学养气质为当时汉族文士所艳羡。王士禛更是讲：“元名臣文士，如移刺楚才，东丹王突欲孙也。廉希宪、贯云石，畏吾人也。赵世延、马祖常，雍古部人也。孛术鲁翀，女直人也。迺贤，葛罗禄人也。萨都刺，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鲁别族也。余阙，唐兀氏也。颜宗道，哈刺鲁氏也。瞻思，大食国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节义、文章，彬彬极盛，虽齐鲁吴越衣冠士胄，何以过之。”（《池北偶谈》卷七，《笔记小说大观》第十六册，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118页。）本书则不仅重点探讨了也里可温的华化原因、过程、表现，还从其原初身份对文学作品的影响作了考察。以马祖常为例，作者认为马氏有强烈的寻根意识，但关注的不是具体的祖籍，而又以自己浸润儒学之深过于邹鲁之士感到骄傲。于是其边塞诗更多的是怀乡，又表现出与其他诗人完全不同的情感体验。可以说，本书正是姚先生所提

倡的“大者远者先之”观念的具体实践，虽然在深度上还有进一步探求的空间，但其已有的成绩能给人以新颖的感觉。

本书作者长期以来从事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为了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又考取了山西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多年努力，终成正果。眼界开阔，思路敏捷是其所长。这在本书之中多有体现。还应指出的是：著名元代文学文献专家杨镰先生，作为特聘教授常来山西大学开展工作，于是作者得以有机会从确立课题到写作的全过程，得到杨先生的指导，开拓思路，解答疑点，所获良多。所以本书的出版，也是对杨先生最好的纪念。学术无止境，我们期待着更多的高质量的成果面世。

牛贵琥

2017年

导 言

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王朝的立国时间不足百年，但疆域广阔，它“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1]，“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2]。

并且，在整个 13 世纪，蒙古人的势力范围所及，并不限于中国。成吉思汗及其后继汗王的政治理想并非建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他们意图称霸世界。13 世纪 60 年代初，忽必烈在当时已相当认同中国，但他仍然声称自己拥有统治世界的权利，希望人们不仅视其为中国皇帝，更应将他看作蒙古大帝国合法的汗王。

在忽必烈时期，统治钦察汗国的阿里不哥是汗位的有力争夺者，他对权落忽必烈的局面并不甘心，而控制察合台汗国的海都则是忽必烈的

[1][2] 宋濂等：《元史》卷五十八《地理一》，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345 页。

死敌，只有中亚伊利汗国承认忽必烈及其子孙的宗主地位，与中国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尽管各汗国之间矛盾重重，但同宗同源的血脉纠葛仍然保证了帝国内部交通的顺畅。有元一代，蒙古人、西域人、中亚人、西亚人和东欧人“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1]。

广袤的疆土、相对畅达的交通以及完善的邮驿制度，为各种族、各民族，各种文化的碰撞、交流与对话提供了契机。这造就了元代文化多元、异质的显性特征。根植于多元文化语境的元代文学由此具有了殊异于其他时代文学的特点，即创作主体的文化身份最为复杂，作品信息的容量最为广博。

元代作家分属不同的社会群体，民族归属多样，且社群身份与民族身份纵横交错。就创作主体文化身份的复杂性而言，没有哪一个时代的文学可与元代文学相比拟。同时，政治地位的等级差异、文化政策的兼容开放无疑加剧了这种复杂性的演进。从作品本身来看，元代文学的殊胜处不在文学品质而在信息含量上。元代文学题材的博远性、视界的开阔性、视角的独特性以及意象的丰富性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所有伴随异质性而来的元代文学图景中，也里可温作家最为独特，也最具文化研究价值。这些作家与西方基督教文化有直接、间接的关联，他们或为基督徒，或来自保有基督信仰传统的部族。异质而等量的文化精神在他们身上呈现了巨大的张力。也里可温作家的创作一方面有力地展示了多元文化共融背景下的元代文学风貌，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考察元代异质文化交往特性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1] 王礼：《义冢记》，载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60册，第654页。

学界关于也里可温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从纵向来看，元代也里可温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学术界一般将基督教于中国的传布分为四个阶段：唐代的景教、元代的基督教、明清之际的天主教、鸦片战争后的新教，也里可温属于第二个阶段。从横向来看，也里可温研究是元代基督教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元代的基督教主要包括景教和天主教，两者虽属同一宗教体系，但差别明显，也里可温研究特指景教而言。

明末出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后，中外学者开始关注景教与中国的关系问题。西方传教士阳玛诺、夏鸣雷、邓玉涵等率先考证景教碑的立碑时间、所载内容；我国的天主教学者李之藻、徐光启等人也积极参与其间。1866年，亨利·裕尔作《契丹纪程》，卷一第六章有“中国的景教”，梳理了景教在华传布历史。1872年，巴拉第·卡法罗夫作《中国史料中古老的基督教痕迹》，其中有对“也里可温”一词的释义，有对《至顺镇江志》和元代白话碑的分析，将蒙元也里可温研究推向纵深。1914年，伯希和作《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徒》，集中考察了也里可温主要人物的信教情况，如爱薛、汪古马氏、马薛里吉思等，开始关注也里可温个体。1930年，穆尔作《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穆尔是东方学家，长期关注中国基督教问题，他的著作内容丰富，文献扎实，特别在论述蒙元基督教时，涉及泉州地区基督教信仰遗迹、景教使徒西行考、镇江府基督徒分布、《马可波罗行纪》对中国基督教的描述，以及天主教方济各会士来华传布的情况等，另附《一神论》《序听迷失所（诃）经》《宣元至本经》等景教基础文献。

中国学术界对元代也里可温的重视始于陈垣。陈垣敏锐地认识到，元代宗教史研究缺失了关键性的部分，即也里可温研究。1917年他发表了《元代也里可温教考》，以汉文史料为依据，全面梳理了也里可温

在元代社会的生存面貌、分布情况、人数比例、代表人物，以及也里可温与其他宗教的关系等。著作史料详备，除充分利用官方典籍如《元史》《元典章》《通制条格》等外，还多方征引金石录、地方志、诗文书画等以成其论。这部论著的出现意义重大，它“不仅为也里可温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资料，而且为整个元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1]。

1924年，陈垣又作《元西域人华化考》，将研究焦点置于西域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交往，涉及也里可温的内容主要有，“儒学篇”中马祖常、阔里吉思等人由耶入儒，“佛老篇”中马节、赵世延等人由耶入道；“文学篇”中马祖常、雅琥等基督教世家诗人的创作，“礼俗篇”中耶人效华俗，等等。这已进入到文化史研究的范围。

有关景教史研究的著名学者还有朱谦之。1966年朱先生完成《中国景教》一书，惜历史原因，至20世纪90年代初才得以公开出版。朱谦之是哲学家，所以他的《中国景教》不仅研究景教东渐史，也研究景教神学思想。论著信息量很大，全面考察了景教的产生、景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景教在东亚地区的传播、景教流行中国的原因、景教碑的文献价值、宋元时期的景教，以及景教在中国的衰亡等，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关中国景教的“百科全书”，它在景教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景教》也广泛地汲取了日本学者佐伯好郎的考古成果。相关的研究还有，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这是一部专题论文集，下篇主讲元代景教；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第二部分专论了元朝的也里可温。近几年，致力于景教及也里可温研究的学者主要有邱树森、宝贵贞、黄子刚、殷小平等，他们对元代基督教的传播、华

[1] 陈高华：《陈垣与元代基督教史研究》，载龚书铎主编：《励耘学术承习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化、生态环境、消亡等问题都作了解读。

有关元代也里可温的考古发现，有重要贡献的是吴文良、吴幼雄父子和牛汝极。吴氏父子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泉州的基督教遗迹。1957年吴文良出版《泉州宗教石刻》，刊布了23方基督教碑文，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通淮门外津头埔乡的叙利亚—汉文双语景教碑；涂门外津头埔村的兴明寺住持碑；回鹘也里可温玛尔达墓碑等，都是极其珍贵的文献。其子吴幼雄又增补50年代后的考古新发现，列石刻图片76幅。

牛汝极的考古范围相对广泛，除泉州外，他的考古遍于新疆、内蒙古、扬州等地。牛汝极主要致力于收集整理碑铭文献，2008年，他将考察所得著成《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牛汝极通叙利亚文，修正了一些碑文解读上的错讹。

与作为宗教的也里可温研究成果相较，也里可温文学研究显然薄弱，独立的、成体系的著作很少。但文学中的基督教因素以及也里可温作家如马祖常、雅琥、金元素等已经引起了学者的注意。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涉及基督教背景的文学家，但其立足点不在文学，在文化史。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有《元色目文人金哈喇及其〈南游寓兴诗集〉》，大篇幅讨论了景教徒金元素的生平和诗歌创作，其中对金元素政治态度与文化态度相互抵牾的判断颇具启发性。杨镰《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分别谈到了也里可温不忽木、马祖常、金元素等作家的文学情况，对他们的信仰背景一并作出考查。张沛之《元代色目人家族及其文化倾向研究》集中讨论了汪古马氏家族成员的文学艺术修养，等等。2000年，张乘健在《文学遗产》发表论文《元剧〈东堂老〉的也里可温教背景》，这是最早关于也里可温与元代文学相关联的研究，但结论武断，徐方朔专门撰文与之商榷。另有关于不忽木、赵

世延、马祖常、雅琥、金元素等人的论文若干，此不赘述。

这些成果夯实了也里可温作家研究的基础。但亦有不足：（1）重视也里可温文物文献考证，而忽视其与文学的关系。宗教与文学都属于意识形态的特殊领域，以文学为鉴，可以很好地映射出也里可温这种外来宗教在中国的处境，很多问题亦可得到全新的解释，比如也里可温在华的衰亡问题；（2）重视文学的史料价值而忽视文学的审美性。对也里可温相关文学本身的艺术成就关怀不足，文学往往沦为历史和文化史的“附庸”；（3）涉及与汉文化的交往问题时，往往以色目文化、西域文化置换也里可温文化，没有突出汉耶交往本质。因此，有关也里可温与文学的论题还存在大量的空白点和盲点需要填充、厘清和探究。

本书将全面耙梳也里可温作家的文学创作成就，考订宗教身份，并通过这一特殊写作群体的研究延伸探讨元代中耶对话模式，还原中西文化交通面貌。

本书的写作难点主要有：（1）也里可温作家宗教身份的确立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如上所述，有些作家确为教徒，有些仅受到部族信仰传统的影响，而一些部族还存在改宗的问题，这需要仔细甄别。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凡是对作家也里可温身份存疑的，均不列入本书的讨论范围。如葛逻禄人迺贤，杨镰先生曾大胆猜测，他属也里可温诗人，但现有文献不足以提供充分的证据，只能留待它论；（2）由于身份意识的差异，也里可温作家与基督教的关系之远近并不统一，对他们作群体研究时，如何能够既关注整一性，总结规律，又不抹杀个体性，避免刻板结论，这需要把握恰当的尺度；（3）宗教是一个敏感话题，特别涉及外来宗教更如此，必须小心对待。我们主要从文化视角来对这种的意识形态作出阐释。

目 录

序

导 言

第一章 也里可温释义

第二章 元代景教之复兴

第三章 康里不忽木家族的景教背景及其文学成就

第四章 汪古部的也里可温作家

第五章 乃蛮部的最后诗人——答禄与权

第六章 也里可温的分化、传教及华耶文化交往

参考文献

后 记

331

318

299

283

72

31

11

1

1

1

第一章

也里可温释义

元代汉语文献称基督教（徒）为也里可温。与也里可温相关的称呼还有迭屑、拂菻、聂斯托里等。

一、什么是“也里可温”

也里可温（Erkeun），是元代汉语文献中使用最多的对基督教及其教徒的称呼。

元代的基督教有教派之分，它包括景教、天主教、希腊东正教和亚美尼亚教派等，其中，与中国关联紧密的是景教和天主教。景教是基督教的聂斯托里教派（The Nestorian Christianity），其创始人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托里（Nestorius）。据钱念劬《归潜记》（丁编之一）：“景教者，基督旧教之聂斯托尔派。据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笔者注），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十二年为建寺，则教入华境，必在七

世纪之初。入中国后，不能不定一名称，而西文原音弗谐于口，乃取《新约》光照之义，命为曰景。景又训大，与喀朵利克（Catholique）原义亦合，可谓善于定名。”^[1]

聂斯托里在基督教神学中坚持“耶稣基督二性二位学说”，与正统的“三位一体”教义相悖，在公元431年召开的以弗所公会议（Council of Ephesus 431）上，聂斯托里学说被判为异端。公元435年，聂斯托里被革职，遭流放。此后，聂斯托里教徒受镇压，大批教徒逃往波斯，东行传教。景教虽属基督教思想体系，但他与正统的天主教不同，是罗马天主教会所称的异端。《圣教史略》卷三《内斯多略异端》：“内斯多略（聂斯托里）异端，他讲论耶稣的天主性、人性，并没有合为一位，不过天主性附着他的人性就是了。为此玛利亚只可称为人母，不可称为天主母，这是一极大异端。”^[2]

景教虽旧教之异端，但论与中国关系之密切，其远超正统的天主教。景教于唐太宗时首入中国，比天主教正式在华传教早六百余年。“也里可温”一词概指景教而言。

“也里可温”的蒙古语语源目前无法确定。钱大昕说：“也里可温氏，不知其所自出。”^[3]其内涵暧昧难明，学者的考释亦聚讼纷纭。清代《元史国语解》认为，依蒙语，“也里可温”应为“伊噜勒昆”，“伊噜勒”是福分的意思；“昆”是部名，“也里可温”即“有缘人也”^[4]。陈垣《也里可温考》指出，在阿拉伯语当中，“也”与“阿”两音互

[1] 朱谦之：《中国景教》，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2] 同上书，第23页。

[3] 钱大昕：《元史氏族表》，载《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页。

[4] 转引自陈垣：《也里可温教考》，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页。